

“有意味”的《晏阳初》： 讲好属于民族、人类、未来的中国故事

□峻冰

的晏阳初，赋予这位去世不远但距不少当代国人较远的真实人物以活生生的立体感、丰富性，为传颂其丰功伟绩和无私奉献精神开启别样而富有情趣之途，作者十年磨一剑而成的四十余万字的《晏阳初》则是头一遭。这许是该书在文体层面颇具新意，也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表征。

《晏阳初》的思想意味

如把《晏阳初》也视为一种传记，但相较于寻常的自述传记或他撰传记，苗勇笔下的传主本事显然增强了故事性、趣味性，也即其“必读性”中的“可读性”被发挥到了极致：既有对各地自然风物的诗性再现，也有大量亦俗亦雅、烘托气氛的对话，以及对矛盾冲突、困难阻碍的浓墨重彩。该书用合情理的文学性想象与大量颇富新意的细节描绘生动再现了晏阳初的一生——从幼时受启蒙教育到年少离乡求学、从学成致用到大展宏图、从国内定县（今河北定州市）试验到异国他乡（远涉菲律宾、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等第三世界国家）帮扶。由于翔实史料、鲜活情境与诗性语言的有机相融，晏阳初胸怀苍生、矢志不移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自1918年自告奋勇前往一战战场的法国军队服务（以翻译身份教育华工营），至1990年载着一生的辛劳和些许未尽之业的遗憾病逝于美国，七十余载，始终未脱中国国籍的晏阳初，始终在践行他当初于青年会驻华工营总结大会上表露的初心：不做官，不发财，为推动平民教育、开启民智、建设新式乡村奉献一生！

古语“有志者事竟成”。晏阳初生于农村家庭，自幼便有为黎民百姓做些实事的远大志向。13岁离家独自赴几百里外（四川阆中、成都等地）的学校求学，期间以悲天悯人的共情与独到别致的观察力，深刻体悟到以巴山“背二哥”为代表的劳苦大众奔波讨生却也能安于贫困、苦中作乐的坚强乐观，亦在心中叹息笙歌艳舞、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的堕落无为。在为保留中国国籍而断然拒绝港英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后，他凭出色的才识与持久的毅力先后取得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学成以后，因深感“新民”教育（把“愚穷弱私”的平民教化成为“新民”）的重要，晏阳初放弃优渥的生活与风光无限的前程，毅然回国，扎根农村，不惧强权，无畏艰辛，持之以恒地在定县、重庆歌马镇等地进行平民教育和新式乡村建设试验。

诚如陀思妥也夫斯基所言：“凡是新的事情在起头总是这样，起初热心的人很多，而不久就冷淡下去，撒手不做了。因为他已经明白，不经过一番苦工是做不成的，而只有想做的人，才忍得过这番痛苦。”在定县与歌马镇的二十余年间，晏阳初以自我人格魅力与令人振奋的理想主义精神，团结有志之士，克服万千困难，咬定青山不放松，最终确立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相结合的平民教育模式及“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的农村改造方案。显然，其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践在本质层面上流露出爱国、爱民、爱教育的思想意义——这种可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胆识勇气和雄才大略，之于今日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筑牢返贫防线及对广大青年的励志教育，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愿景，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这样评价道：“我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时，对晏阳初的试验就做了深入了解。晏阳初在乡村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改善公共卫生等，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思及苗勇的《晏阳初》2021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恰值“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时任四川省工会副主席的作者，立

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其心理理应有这样一种关注现实的意指，一种“向未来”的眼光，一种“兼济天下”的情怀。

《晏阳初》的文化意味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人民历来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信心和抱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诚如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处境和命运虽不尽相同，但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为改变命运的不屈奋斗却是共通的。中国文艺工作者书写这种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及为此助力的仁人志士，既容易引起广泛共鸣，自也可以彰显中国人民历来具有的“天下情怀”。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唯有伟大的人格和精神。晏阳初曾说：“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圣奥古斯丁说：‘在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都有神圣之物’。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由此可见，晏阳初是有伟大的人格和精神的；其言行、事迹为人书写、传颂，自在情理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苗勇的长篇传记文学《晏阳初》就是对晏阳初这位平民教育先驱者心系万千底层大众、“一心甘为孺子牛”的济世情怀的艺术性再现，也是对其伟大人格和精神的缅怀与传颂。在接受采访时，苗勇将晏阳初的人格与精神概括为三点：讲好中国故事的先行者、国内乡村教育建设的领军人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者。诚哉斯言！回首晏阳初把早年服务法国华工营的经验应用于国内创建平教总会广传薪火，从单一的平民教育探索到扎根定县等地进行全方位的平民教育实践和新式乡村建设改造的艰辛历程，他确乎实实在在地践行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中国古训的朴素理念，并为祖国乃至世界上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乡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实事求是地说，苗勇的《晏阳初》是一部“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的，较好地“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文艺作品——晏阳初在上世纪50年代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并在上世纪60年代于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且曾出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顾问等，都以“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鲁迅语）的国际帮扶为此作了很好的注脚。能够说，该书乃中国作家为世界递上的一张中国名片，它以坦荡、朴素但令人动情、动容的浪漫现实主义抒写，讲出了也讲好了属于民族、属于人类，也属于未来的中国故事——该书入选2021年度东方出版社十大人文社科好书可为明证。实际上，透过此书，我们亦能深刻地体察到晏阳初的“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之于承载希望、归属未来的年轻人的意义：于莘莘学子而言，晏阳初的人格和精神犹如一盏指路明灯，在面对“伪历史主义”“虚无主义”“精致利己主义”袭扰时，能厘清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正视世间大道，明晰前行之方向；于踏入社会的青年人而言，晏阳初的人格和精神好像一副能启明不惑、治愈身心顽疾的良方，使人在铭记“仁、义、礼、智、孝、勇”的同时，驱散奋斗途中的阴霾，沉淀岁月厚积的芬芳。愿如《晏阳初》这样的有情怀、有担当的文艺作品能更多地涌现。



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认为“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是“有意味的形式”，其标识任何艺术都是创作主体按照审美的规律和形式法则对物质世界和情感世界合情合理的把握。若不限于视觉艺术，而是扩及所有艺术形式（包括文学），也不啻注目于形式——因形式与内容往往是不可分的（形式常内孕为内容，内容也常外化于形式），那即把这这一许是艺术（尤其是优秀的艺术品）共有的“有意味”的观念，援用于对苗勇所著《晏阳初》的审视上：注目其文体、思想，抑或文化传播。

《晏阳初》的文体意味

为人立传，写法大致有三：一是叙事完全忠实于传主本事，不是虚构；二是叙事主体忠实于传主本事，情节、细节稍作虚构；三是叙事大略忠实于传主本事，情节、细节多作虚构。因此，文坛便有史传、别传、外传等的分野。审慎研究，可以见出《晏阳初》应属第二种和第三种杂糅的情况，即叙事主体依据史料，忠实于传主晏阳初的生平事迹，具体的人物情感、事件细节等则作较大程度的合情合理的虚构。

作为作家，从苗勇以往所著来看，这位视文学创作为业余爱好（因其还持续担任文艺或其他方面的管理工作），写过诗歌、散文（出版有诗集《山韵》，散文集《山民》《散落的文字》等）的作家，主事报告文学创作（出版有长篇报告文学《丰碑》《历史不会忘记》《走出山脊见的世界伟人》等）。而这种写作的经历，恰巧成就了《晏阳初》的独创性格局：一部颇像长篇报告文学的传记文学，它既有尊重事实、回归历史的现实主义的一面，亦有用情放飞诗意的浪漫主义的一面。概言之，这种突破边界、跨类融合的浪漫现实主义文学书写，融会贯通了多领域、多样式的创作经验，待到极致，便有可能产生令人震撼的文艺精品。

许因晏阳初在国内的建树多在1949年以前，其1951年后的影响又多见于异国他乡，加之国内改革开放前较闭塞的现实境况，数年间，国人不识晏阳初，从川人更不识晏阳初，而其却是地地道道的从巴山蜀水中走出的中国人（祖籍现为巴中市巴州区三江镇中兴村五社，23岁前均在巴蜀大地生活、求学），一个闻名世界的现代平民教育家和国内新式乡村建设的开拓者。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晏阳初全集》《晏阳初文集》《晏阳初纪念文集》《晏阳初传》《告于人民》《晏阳初传略》等书问世，但以颇似小说的传记文学的手法（自然揉进了报告文学的纪实手法）来描摹生于1890年逝于1990年